目　　录

南京谈判的始末……吕振羽（1）
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江　明　王建中（15）

大革命时期的得月乡农民协会……刘若钦（30）
大革命时期的片断回忆……吕　巍（33）
大革命时期邵阳县农民运动概述……钟玉恒（36）
蒋氏铲共委员会……蒋次青　姚龙波（46）

回忆我在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战干班……易泽湘（49）
记孟关战役中的周国耀……王毓秦（57）
浙赣会战建德战役一角
——记乌龙山阻击战……王敦武（60）
回忆我在抗日戎伍暨起义前后……朱循礼（63）
记时雍乡人民抗日……吴福祥（70）
伍立中锄奸杀鬼子……伍叔雄（74）

回忆“二·二二”白仓起义……莫新春（76）
回忆湘中二支队三团的斗争……莫昆州（82）
我在邵阳市被捕前后……陈常耀（95）
长沙和平解放的片断回忆……王敦武（100）
回忆我在西南军政大学的三年……吴福祥（102）
回忆“九·二五”起义前后的欧阳卓……赵　堃（11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江背岭剿匪 ……肖奇峰（114）

忆黄炎培先生在四川泸州 ……易泽湘（116）
徐君虎治匪 ……肖超然（119）
记宝庆工运领袖向暄烈士 ……孙纯贵（121）
记蒋贻江烈士 ……吕亮清（127）
追忆岳父林骥骥老夫子 ……唐春农（130）

邵阳县回族简介 ……张贵成（136）
九公桥回民简介 ……海变敏（140）

附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邵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名单 ……（141）

南京谈判的始末

吕振羽

南京谈判，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间举行的，前后历时九个月。这是我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谈判。这场谈判，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刘少奇同志指挥下，直接围绕国共联合抗日这个历史要求进行的。它对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公然伪造历史，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少奇同志，并广事株连，罗织冤狱。

事实究竟怎样？我是这场谈判的直接参加者，有责任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之后，加紧推行吞并中国的步骤，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功，而国民党

吕振羽(1900.1.30—1980.7.17)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邵阳县金称市人。

政府继续执行其卖国内战政策，构成了中华民族空前严重的危机，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我党根据国内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改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采取许多积极措施，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及其魔爪步步伸向华北、华中等地的侵略行动，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英、美帝国主义由于在华的利益直接受到打击，对日态度开始改变，因而也就影响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中的英美派。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小朝廷的统治，也不得不要求抗战，要抗战就必须联共，这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南京谈判合作抗日的一个背景。

一九三五年冬，我收到一封南京来信。写信人谌小岑，也是湖南人，曾在主办《丰台旬刊》时经翦伯赞介绍而同我相识的。写信时，他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任劳工科长。来信的大意是：东邻侵凌，冀姜两府宜联姻御侮；兄如愿作伐，请即命驾南来，云云。

当时，我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市委由周小舟同志经常同我联系。我就把谌的来信交给周，请示市委如何处置。周小舟同志说：“市委讨论后再答复你。”

数日后，周小舟同志通知我，大意是：市委要你辞去教职，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

同年十一月底，我抵达南京，住进新街口的一家旅馆，当即电话通知谌小岑。谌小岑对我说，此事系南京方面掌握工矿企业的宋子文主持，由铁道部常务次长曾养甫出面。在谈判过

程中，曾、谌始终说是宋子文主持的。并说蒋介石还不知道。我说，蒋介石不知道，如果谈判成功，能够实行吗？他们就说，将来是要告诉他的。

在到南京后的当天晚上，谌小岑来到我的住处，陪我到鼓楼曾养甫家中，进行第一次会面。我问道："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是曾先生自己的主张吗？"曾答："我是秉承宋子文先生的意旨办事的。"并说："日本占领东北，又在华北搞特殊化，走私又到了长江流域，看来非抗战不可了。你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同我们谈判的线索吗？"我表示，"不敢肯定，但也可能从北平的教授和学生中找到这样一个线索。"当时谌向曾介绍说："吕振羽先生是北平的大学教授，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史学家。"曾说："吕先生，你是历史学家，如果我们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不会把我们作为克伦斯基政府吗？"我说："克伦斯基当时搞成那个结果，是他们自己的政治行动形成的，并不是旁人把他们弄成'克伦斯基政府'和那样下场的。"

周小舟同志得到我关于上述情况的书面报告后，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第一次到南京，我把他安置在新街口北面的一家大旅馆，离我不远。他告诉我，组织决定要我留在南京，和国民党继续进行接触。同时，他向我传达党的指示：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我们要以这些作为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先决条件。

我随即通知对方，谈判线索已找到。曾、谌二人希望我"继续留在南京，作为中间人，从旁协助谈判。"我根据周小舟同志的意见，向对方提出："既要我留在南京，我在北平的教授职务就不能担任，因此，我的生活费应由国方支付。国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必须保证共方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和扣留。”曾说：“可以保证”。随即他们送来函件，以聘我为铁道部专员的名义，月致二百元车马费。这些钱，也就成了我和周小舟二人在南京期间的生活费和小舟北归的路费。当时，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造谣说：“吕振羽把自己出卖给国民党，每月三千元。”完全是别有用心。

在周小舟同志北归前，我陪谌小岑到小舟住处，第一次介绍他们会晤。

周小舟同志北归后，我根据他传达的精神，在和曾养甫的谈判过程中，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共产党的上述两项先决条件，双方辩论得很激烈。曾说：“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日联军。”我反驳说：“国民党常自称‘党国’、‘党军’，这就是说，国民政府只是一党的政府，国民革命军只是一党的军队。”曾还代表国方提出了四点反要求，大意是：一、停止土地革命；二、停止阶级斗争；三、停止苏维埃运动；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事后，我立即把这些情况向周小舟同志作了书面报告。

三月，周小舟同志第二次到南京，传达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原则要求（连同上次两项在内）。大意是：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针对国民党的四点反要求，周小舟同志传达了党的有关指示精神：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全部历史

过程的必然现象，谁也无法停止，也不可能制造出来。在合作抗日的形势下，只要国民党实施适合工农要求的适当政策，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调整阶级间的关系，我们为战胜日寇，加强国内团结，可施用影响，实行战时阶级休战。二、国民党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为了团结抗日，除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外，我们将考虑在战时暂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三、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但不得改变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并以之作为全国抗日民主政权的示范。四、在组成国防政府的情况下，国方所提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存在。

在周小舟同志第一次到南京时，我曾提出入党要求和看党的有关统战政策的文件的希望。这一次见面后，周小舟同志正式通知我，组织已批准我的入党要求，一九三六年三月入党，无候补期，为正式党员。并说，我的工作由陈酉生（即王世英）直接联系，以后每次有关谈判问题的秘密通信，一封寄天津陈酉生，一封寄北平周小舟。小舟同志给我看了他随身带来的陶尚行写的关于统战文章的油印本。我问：“陶尚行是谁？”他说：“北方局负责人，是一位很优秀的领导同志。”他还给我带来了党组织给代表的“训令”和秘密通信用的药水。“训令”用药水洗出后，已不完全，只有下面几个字还清楚：“派你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望继续……。”小舟同志还带来了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署名盖章，用墨笔书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白绸信件，每信均附我党的《八一宣言》，由我和小舟同志分送到各人负责的机关，有的请人转交。在从北平到南京的路途中，小舟同志把这些信件放在胸前的西装口袋里，我听了不禁

捏了一把汗。当时，小舟同志赋诗一首示我。诗云：

片衫片履到都门，伫足三年悟死生；
拟向荆卿求匕首，雨花台畔刺嬴秦。

我和诗一首。诗云：

潜踪南渡到石城，艰危未计死和生；
力挽狂澜联吴策，残篇断简续亡秦。

五月间，曾养甫在和我谈话时怒气冲冲地说："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四、五万条破枪！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骂我们委员长是卖国贼头子。历史上实力就是是非。说我卖国，我就卖国，我有力量，共产党其奈我何?!"对曾的这种嚣张气焰，我很气愤，严词批驳说：贵党和津沪一带报纸不是每天都还在骂"朱毛匪"吗？至于曾先生所说，历史上也确实有人那样说过，而且那样作过，但历史都给他们一一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这是可为殷鉴的。不过我相信国民党有些先生还是赞成抗战的。谌小岑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彼此都是老朋友，不要生气。回到住处我写下了《祖龙吟》一首：

无穷潜蓄在人民，强弱从来系旧新。
论定是非岂任己，果决成败皆由人。
祖龙误堕骊山梦，赵高强指鹿马真。
夫子庙前弹艺客，人人茹古说嬴秦。

随后，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我表示：这样转达来转达去，不解决问题，希望共产党派个代表来谈判。于是，约在六、七月之际，周小舟同志第三次来到南京。我把这期间的会谈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说："你谈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接着，周小舟同志以正式代表身份和曾养甫在铁道部二楼曾的办公室

举行正式谈判，我和谌小岑参加。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是根据上述各自提出的内容进行折冲的。曾养甫要周小舟同志先谈。小舟同志便系统地提出了我方的六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方的四点反要求作了回答，我在旁边作了不少补充。小舟同志说：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可以考虑的。但必须由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各军代表组成战时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这才能说是可以考虑的，也才能承认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国民党必须保证在军需供应、防区划分和作战任务的分配等方面，均应一视同仁，不得有任何歧视。曾表示：这些都是可以保证的，但必须服从最高统帅部的统一指挥和调遣。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开赴察绥边境一带驻防，待机东进，但不得干预地方政府的事务。会后，小舟同志对我说：以察绥边境为防区，背靠外蒙，未尝不好，然后进入东北，开辟抗日战场，只要国民党在关内真正实行抗战，那也是可以的。对于曾养甫提出的南方各省游击队，由各省分别指定地区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小舟同志断然拒绝，说："绝对不能同意。"这样，曾养甫不得已，说：那就指定路线，让南方各省游击队北上和主力红军会合。小舟同志说，国民党必须保证我们的部队安全通过，不得中途截击。曾养甫答应这不成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周小舟同志说：凡是以共产党罪名或抗日爱国罪名关进监狱的，都应该一律无条件释放。曾说：这很好办，请共产党提个名单来。（会后，我对周说：可能有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开了名单，国民党可以按名单进行迫害和策反，这是要警惕的。周同意。）但他们出去后，不得进行反国民党的活动。我说：只要国民党真正抗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

曾养甫又提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共产党现在不要搞马克思主义，希望共产党和我们一道来实行三民主义，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再由共产党单独领导搞马克思主义好了。过去国共合作、国民革命，都是奉行三民主义的。小舟同志批驳说：过去在广州时代、武汉时代，三民主义作为四个阶级联盟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不要三民主义以后，我们领导下的工人、农民的斗争，都是没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曾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有很多共产党策动的阶级斗争，有时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说：曾先生这个说法可不对，现在正式谈判合作抗日，不是来骂架的。要骂架，这就没法谈下去了。曾说：不是我骂架，因为周先生说我们不要三民主义，我才这样说的。我又说：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严肃的理论问题，不是一、二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会谈结束后，谌小岑送周小舟同志至楼下，我故意留后一步，问曾养甫对周代表提出的六项要求有什么意见，希望能给以具体答复。他说：共产党对谈判没有诚意，派一个小孩子来作代表。我告诉他：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年轻的，我看倒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能否负起责任和解决问题。

在周小舟同志离开南京以前，为取得国方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我至少去找曾养甫面谈过五、六次，谌小岑有时在座，有时不在。面谈的大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我同曾养甫面谈关于国防政府的问题。我说：周代表临走时，要我将国方对他在会谈中所提出的六项要求的答复转达给他，现在请你将国防政府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曾说：

我们已肯定答复过，国民政府即国防政府，周代表也说，以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可以考虑的。因此，这个问题可说是已经解决了。我说：周代表说可以考虑，是有前提的，就是由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各军代表组成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问题就在这里。曾说：那好办，我们可将立法院扩大，将各方代表人士包括过去。我说：这绝不能代替战时民意机关。有些立法委员，自己也说他们是柜台里的陈列品，谁也清楚，他们自己立了些什么法，不过是立了些约束和制裁抗日爱国人士的法，丝毫也没有立过制裁汉奸卖国贼和走私集团的法。曾说：扩大立法院的组织以后就不会是这样了。

第二次，我同曾养甫着重面谈关于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的问题。我对曾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向曾先生转达过，周代表在正式会谈中又正式提出过。国民党成百万军队没有一兵一枪去对付日寇和汉奸，而是全部用来进攻苏区，“围剿”工农红军。国民政府几十万全副武装的税警，并不是用去稽查日军、朝鲜浪人和走私集团横行无忌的走私，而是对付民族企业的商品流通和民间的小商品流通。这种十分不合理的现象，只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徒然消耗民族抗战的力量。曾强辩说：停止内战双方都有责任。现在，共产党到处煽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搞游击战争，共军到处找空子袭击国军，使国军动弹不得，这是更厉害的消耗民族抗战力量，分裂民族团结，破坏中国农村传统的安定情况。我说：事实恰恰相反，红军和南方各省游击队，经常遭到国军的包围和袭击。至于农村的土豪，他们和农民并没有什么平等团结的关系，他们是统治农村和吸尽农民膏血的封建残余。据我所闻，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打游击，完全是被迫的。曾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完全不

是这样的。

第三次，我同曾养甫着重面谈关于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的问题。曾强词夺理地说：本来是自由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禁止他们这种活动。现在据我们所知，到处所谓抗日爱国群众运动和所谓"飞行集会"之类的事情，无不是玩弄阴谋的政党密谋策动的。我很生气，反驳他说：难道"七君子"的爱国言论和行动也都是被人阴谋策动的吗？因为发表《闲话皇帝》而被判罪的杜重远先生和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难道也是受人阴谋策动的吗？曾养甫理屈词穷，只得推说：关于这类事情，是非常曲折、非常复杂的。曾又说：周代表也承认三民主义是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散发的宣传品，题目和封面是三民主义，内容无不是攻击政府和谩骂蒋委员长的。我说：问题不在于口头上怎样说，而在于是否认真实行，在孤陋寡闻的我看来，找不出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有什么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曾说，就说吕先生自己吧！听说你有历史著作出版了。谌小岑也曾说，你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的，难道那里面有三民主义吗？我想那里面只会有马克思主义，不会有三民主义。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曾先生，你很可以这样说，我的著作和陶希圣、胡适、叶青等人的著作比较，只比他们多了些历史真实性和爱国思想。

第四次，我同曾养甫着重面谈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问题。我说：周代表提出国方应把一切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等罪名被监禁的政治犯无条件释放。曾说：只要共产党开个名单来，保证他们以后不从事反对政府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按名单释放。我说：这样做就不是无条件释放而是条件很苛刻。在通

布各地的监狱中，究竟关了多少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的政治犯，恐怕谁也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曾说：任何国家释放被监禁的人出狱，都不能不要他们表示对政府的忠诚态度。我说：至于他们出狱后，如果政府的施政同民族利益和他们本人的利益相矛盾，难道谁能禁止他们的一切反抗行为吗？国方是否无条件释放他们，周代表说，这是关系到国方是否真正与民更始，有无抗战诚意的问题。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抗日的骨干。曾养甫说，吕先生，你这个说法是“书生空谈”。我说，我绝不认为是这样。曾又给我出难题说，如果你现在知道什么人关在哪里，我们马上可以把他们释放。我便回答说：我的老师董维键，是留英博士和研究英美文学的，还有和他一起的张唯一，听说现在还关在南京的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曾尴尬地说，我们可以了解了解。后来，董、张二人一起被放出来了。在抗战时期，我在长沙曾碰到过他们。他们高兴地对我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被放出来的。

以后，大约在六、七月之际，有一次我去找曾养甫，他对我说：“这样的谈判不解决问题，希望周恩来来南京，我或张冲去延安。”不久，谌小岑面交我一份密电码，并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自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我以秘密通信告知陈西生、周小舟两同志。

在谈判过程中，周小舟同志曾传达党的指示，要我设法取得国方的书面材料。因此，国方对我方所提要求的答复和他们的反要求，我都设法要谌小岑写好后给我，谌都是亲笔写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便笺上的。

我在南京谈判期间，得知原在广西红七军任团长的袁也烈同志（原名袁炎烈，此时化名袁映吾），在战斗中负伤，到上

海养伤，遭敌搜捕，监禁数年，出来后，又陷在南京。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向北方局汇报后，让我约同袁也烈同志到秦淮河游艇上会面。此后，小舟同志在北归前通知袁到北方局接头。同时，我又通过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当法官的小同乡肖仲阶，要他设法帮助袁离开南京。后来，袁辗转到北方局，恢复了党籍，又投入了火热的战斗。

在此同时，我抓紧在谈判的空隙，完成了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工作，袁也烈、李邦彦二人帮助我抄写了这本书的原稿。当时，我曾作诗一首：

夜雨寒灯续旧缘，白山烽火客衙黑；
钓鳌来载秦淮月，写就新篇劳巨椽。

八月，周小舟同志又一次来到南京，我将所有材料和密电码全部交给了他。他说，他回到北平后马上就要携带这些材料去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这次南京谈判的全部经过和情况。小舟同志到延安后，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他当时带到延安的这些材料存在中央档案馆。

谈判完全终止后，我就离开了南京，当时的情景，正如我在《谈判——离南京》一诗中所说的：

荷命南来白下时，日侵蒋暴痛离支；
手携"八一"谈联合，面对逆横自护持。
左顾右盼情悻悻，外强中干语刺刺；
无常冷热日邦色，密码交来意太迟。

以上就是关于这次南京谈判的前前后后，是铁铸的历史事实。是功是罪？历史早已作出了严正的裁决，人民也自有公论。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囚禁在京郊狱中，非法审讯近八百次，其中七百

多次都是为了当年的南京谈判问题。他们伪造历史，颠倒功罪，硬说我和少奇同志“狼狈为奸”，硬说我参与了少奇同志“勾结”蒋介石“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阴谋活动，硬说经过周小舟同志传达的是“陶尚仁（“仁”，原文如此）即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指示”，硬说我和少奇同志“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硬说南京谈判是背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干的。他们还造谣说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二年自华中回延安的行军途中被俘叛变，跪倒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如此等等，无中生有，必欲置死地而后快。追忆历史，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有关指示来衡量，当时周小舟传达的少奇同志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回想当年，周小舟同志和我，受党和阶级的委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遵循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南京谈判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谈判过程中，我只知道国民党方面发起和主持谈判的是英美派的宋子文，根本不知道是蒋介石，也不清楚蒋介石玩弄的什么阴谋。至于当时北方局负责人陶尚行就是少奇同志，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与少奇同志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接触。我见到我们谈判中一直没有出面的这位指挥员——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底，在我到达苏北根据地的当晚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而知道陶尚行就是少奇同志，那是更后的事了。这怎么能说我参与了少奇同志“勾结”蒋介石“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阴谋活动呢?!这真是二十世纪的“风波亭”。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情况：关于南京谈判，一九六一年前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主编申伯纯同志，曾找谌小岑写过一份材料。申伯纯曾亲自对我说：“谌小岑写的这

份材料，我到档案馆核对了原始材料，材料是真实可靠的。”后来，他又对我说：“这份材料我送周总理看了，总理很重视，并叫我把它送给周小舟看一看，当时周小舟正在北京开会。周小舟看过这个材料后说：‘情况就是这样’。”以后，我也问过王世英同志。我说：“关于南京谈判，申伯纯找谌小岑写了份材料。”王世英同志说：“我已看过了”。我讲这个情况的目的，就是为了好让后人从当时谈判双方的参与者所提供的情况中了解事实真相，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我想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所应有的正确态度。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千古奇冤，大白于天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永远忘不了那在虎穴战斗的日日夜夜，我更加怀念指挥我们胜利进行斗争的少奇同志。

1980年6月于北京

（转载自《新华日报》1980年第10期）

回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江　明　王建中

一九三八年夏，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为保全实力，从徐州撤退，著名的马当防线，也没有经过剧烈战斗和取得适当代价，即行放弃。日军仍一面继续实行诱降，一面调集南北两战场的兵力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全国最富裕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著名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人民惨遭屠杀和侮辱，流亡载道。五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批判了国民党的"亡国论"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的消极防御、阵地战、消耗战；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和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错误，精辟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依据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可能进攻湖南的形势分析，便加紧动员和号召全省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并由昌振羽、谭伯羽以名流学者名义致书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保卫大湖南"的要求和主张，彻底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准备条件，于日寇进攻湖南时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及与正面战场配合等等。徐老并主张在日寇攻入湖南时，我党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湖南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